

省港大罢工中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广东) 彭 涛

世界上历时最长的工人罢工当属1925年6月19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它持续16个月,承载着爱国情怀,以组织之严密、领导之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的特点被永载于国际工人运动史册,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书写这一伟大篇章,凸显了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斗争策略的伟大力量和深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省港大罢工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的。从罢工前的筹备,到罢工发动,再到罢工

过程中与帝国主义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到省港大罢工的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罢工的领导核心,始终发挥着领导作用。

首先是罢工前的准备。省港大罢工的直接导火线是英帝国主义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英租界巡捕开枪扫射示威游行的民众,当场死伤数十人。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关于声援上海人民斗争的指示,决定指派邓中夏、孙云鹏、杨匏安等人前往香港,与已在香港的共产党员黄平、苏兆征等商议罢工的问题。据黄平回忆:“整个罢工的准备工作都是由邓中夏和苏兆征(领导)进行的。”为了加强对香港方面组织发动罢工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指定邓中夏、黄

大罢工的情况,热情赞颂罢工工人的反帝斗争和英勇表现,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对于推动国内革命形势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如他在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上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称赞省港罢工工人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给了英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同时还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势力对于省港罢工以及各地工农运动的污蔑攻击。

根据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工人回忆,1926年3月间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邓中夏等一道,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给予坚决打击。他为

此还与邓中夏详细研究过,并主张带领工人纠察队到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年之后,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闻名于世,成为代表包括25万省港大罢工工人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唯一出路。

省港大罢工已过去95年,无数革命领袖、先烈和英勇战士已随历史远去,但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人间正道历经沧桑曲折,愈加宽阔。不忘这场大罢工中可歌可泣的斗争初心,有助于牢记我们党的阶级基础,牢记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主体观,完成新时代的使命。

(责编 王燕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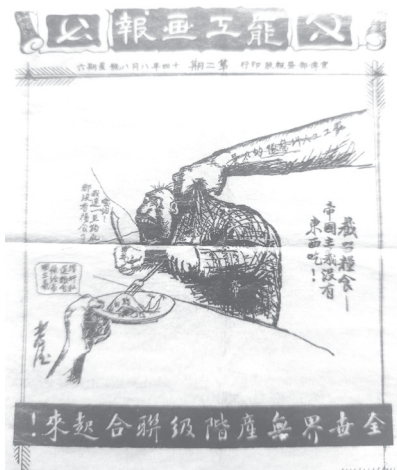
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5人组成党团,组织罢工的发动。

其次是罢工的发动。在苏兆征等人带领下,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务工人于1925年6月19日正式打响这次反帝罢工斗争的第一炮。由苏兆征等参与和主持起草的罢工宣言指出:“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致)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再次是罢工过程。罢工伊始,港英当局震惊,镇压罢工工人。半个月左右,参加罢工且离开香港的工人超过20万人。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广大罢工工人同仇敌忾地对付英帝国主义及各种反动势力,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等领导人决定成立坚强且健全的组织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7月3日,林伟民主持了第一次会议,在工人运动中拥有良好威望的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为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

决定在罢工委员会中成立中国共产党党团委员会,作为罢工斗争的领导核心。初时指定李森为书记,由冯菊坡、刘尔嵩、施卜、林伟民、李森、陈延年6人组织党团;邓中夏、黄平、陈延年等先后由香港返回广州,党团随之扩大。每晚开会一次,对罢工事宜作出决策。为了有效确保罢工斗争的胜利,罢工委员会及时扩充了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期间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成为罢工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其意志的、捍卫广大罢工工人利益的、敢于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革命队伍;成立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各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代表,重大事情经集体讨论决定,保证罢工的各项政策和策略的贯彻执行。由于各项工作有序推进,1926年6月19日,罢工委员会组织5万人集会纪念反帝罢工一周年,苏兆征在会上总结罢工斗争的成效时说:“英帝国主义受重大之打击,现今损失已达14亿元。”他还发表《去年今日》的文章,指出:“省港的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受无限之损失,至今喘不过气来。”

最后是罢工结束。由于北伐战争的深入进行,武汉成为革命中心,省港罢工成为次要的局部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经过慎重研究和讨论,决定结束罢工。1926年9月30日,苏兆征主持召开省港罢工



省港罢工委员会印发的宣传品



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左)、邓中夏在讨论罢工事宜

工人代表大会第一六六次会议,讨论变更罢工政策,结束封锁香港的决议。10月10日,苏兆征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正式宣布从是日起停止封锁香港和结束罢工的决定。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圆满完成了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任务,使党的政治威信得到巨大提升,为后续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工人阶级为主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入侵中国,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他们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划分势力范围,搜刮财富,掠夺资源,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以鸦片为代表的商品输出转变为以兴办船舶制造业和轮船公司等为



1925年6月23日,省港罢工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市紧邻沙面租界的沙基路

主要方式的资本输出。由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共同催生的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带来苦难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他们也最早通过各种工人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1922年1月12日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为期56天,邓中夏称赞“香港海员首先便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这次罢工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苏兆征、林伟民等组织和发动,这为他们与邓中夏等共产党员组织和发动省港大罢工积累了斗争经验和群众基础。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务工人首先发动罢工;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宣布罢工,目的在于“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①罢工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分道返回广州。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罢工。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说:“工人阶级团结,便是力量团结……我们一定要像俄国一样,不分地方、种族、国界,团结起来,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才是我们的胜利。”^②在苏兆征、邓中夏、林伟民的卓越领导下,加上各地千万工人募集而成的一笔笔捐款的资金支持和各地的“工人后援会”,加入罢工行列的香港工人迅猛增多。当年6月23日,英、法等国军队在广州制造的沙基惨案引发了罢工狂潮,6月底的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革命洪流,向着帝国主义冲击。

1926年6月19日,罢工工人集会纪念罢工一周年,苏兆征撰写发表《去年今日》一文,指出:“沙基以及‘五卅’以后各地大屠杀,中国人民所给予帝国主义的回答,便是到处发生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罢市、罢工、罢课各种运动乃至风靡于全国……上海的罢工使全国民众都起来。”这足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省港大罢工给予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各行业工人的内部团结极大程度上确保了罢工的胜利。

农民阶级的支持

“对付帝国主义的策略没有许多,只有一个,这个策略简单的三句话就是:团结自己的势力,联合我们的战线,作持续的奋斗!更详细地说出来就是:团结全国各阶级,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持续地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③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如是说,因为他深深懂得“一条黄麻打成的细绳容易拉断,一束黄麻结成的绳索就能把大轮船拴住”的道理。除了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使之成为省港大罢工的主力,由共产党员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善于正确执行和运用党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首先被纳入统一战线的便是农民阶级。

中国的产业工人有很多是由农民转为工人的,苏兆征便是典型的代表,这显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苏兆征和林伟民强调:“海员工人要加强团结,不断战斗,保护自己的利益;要加强工农兵的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完成中国革命。”^④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苏兆征曾派出罢工工人骨干到农村宣传罢工政策,帮助农民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在罢工工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广东的农民运动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1926年初,参加农会的就有60多万农民。各地农民也积极起来援助罢工,汕头、宝安、惠阳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主动协助工人纠察队检查英货、封锁香港,农会会员还无偿为工人提供粮食,相互间结成密切的工农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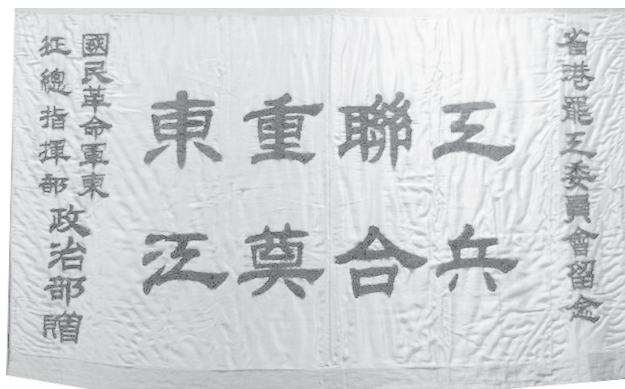
1926年5月初,广东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与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联合慰问省港罢工工人。苏兆征代表罢工工人表示:“现在罢工虽已逾11个月,但工人已决心为求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达到第一步的解放,虽巨大牺牲亦在所不惜。今日得工农代表前来(慰问),从此我们革命势力更加密切团结,罢工就一定达到胜利。”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帮助

苏兆征与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对在省港罢工中争取与广东国民政府合作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正如邓中夏指出的:“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党纲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责的。省港罢工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像张作霖一样对爱国运动加以摧残,而应该加以爱护的。”“假如当时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

当时,广东地区局势混乱,内忧外患,广东国民政府地位很不稳固,亟需得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群众力量的支持。而一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罢工队伍云集广州,也就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坚强支柱。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东国民政府互相支援,国民政府成为反帝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此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省港罢工组织的独立领导权的同时,苏兆征、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十分注意加强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密切合作,聘请廖仲恺等为罢工委员会的顾问,经常就重大决策和活动与之商量,听取意见,争取支持。廖仲恺一再表示:“在政府方面,尽力为全民而争;在(国民)党方面,也出尽能力而争。”

除了赢得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对罢工的支持,苏兆征等领导人也组织起一支由几千名罢工工人组成的运输队,参加了1925年至1926年国民政府实行的东征、南讨和北



国民革命军东征时送给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锦旗

伐,对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的援助

在省港大罢工初期,罢工委员会由于认识上的局限、经验的缺乏或过度情绪化,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货仓”,罢工切断了进口,日常的对外贸易活动中断,广东地区的工商业受到影响,使“既要爱国,又要有生意可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失,势必影响到他们对省港罢工的支持。

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人根据形势,从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出发,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调整为“单独对英”,提出“特许证”制度,确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⑤的原则。在廖仲恺被刺事件后,罢工委员会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进而提出“善后条例”,促使广东境内的自由贸易日渐繁荣。当时,广州每日都有四五十艘船进入港口,为广州地区从未有过的现象。“单独对英”的罢工中心策略既“保障罢工”,又“体恤商艰”,使广州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得到很大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参加反帝斗争的热情。他们表示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⑥香港地区工商界虽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密切,但在经济利益上也与之存在矛盾与冲突,亦不满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罢工让他们尝到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苦头,对省港罢工持同情态度。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省港大罢工一开始,苏兆征等领导人通过各种途径,向华侨广泛宣传罢工的意义和正义性。1926年1月中旬,海外华侨代表180余人组成海外回粤华侨参观团,返抵广州参观访问。罢工期间,南洋爱国华侨实业家陈

嘉庚公司的一批胶轮被纠察队员“扣留检验”,苏兆征知道后,立即提交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讨论,一致认为:“陈(嘉庚)为南洋巨商最能牺牲个人财产,以谋增进国内教育之人,且所制造新式货品与外国工商业争衡,应予通融发还。”省港大罢工爆发以来,“所有经济多赖各国华侨捐助,先后汇交省港罢工委员会,至今源源不绝,可见华侨对于此次向帝国主义罢工,极尽热烈之援助,衷心爱国甚可敬佩”。^⑦1926年3月底,苏兆征报告罢工以来的财政收支情况说:“此次罢工共收入290余万,华侨占190多万。”由此可见,海外华侨对国家、民族饱含的拳拳爱国之心。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至翌年10月结束,使香港英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受到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持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讲师、硕士。本文为广东省珠海市2019-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研究”(编号:2019YC0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⑤⑥⑦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133页、153页、155页。

②《工人之路特号》(第287号),1926年4月11日。

③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

④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历史名人研究”课题组:《珠海“红色三杰”的政治思想及启示初探》,《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责编 王燕萍)